

《管理学季刊》主编论坛

——与顶级期刊主编对话：“新形势下中国管理的研究与发表”

2020年10月11日,《管理学季刊》主编论坛——与顶级期刊主编对话:“新形势下中国管理的研究与发表”于线上成功举行。《管理学季刊》编委会邀请了10位国内外权威期刊的主编(副主编)进行对话。五位英文期刊主编包括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JIBS) 领域编辑池太岚教授(Tailan Chi),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SEJ) 副主编李涌教授(Yong Li),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AMR) 副主编王鹤丽教授(Heli Wa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MJ) 副主编姚咏仪教授(Daphne Yiu),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SMJ) 副主编赵敏渊教授(Minyuan Zhao)。五位中文期刊主编包括《南开管理评论》主编白长虹教授、《管理评论》副主编乔晗教授、《管理世界》李志军社长、《管理科学学报》主编张维教授和《管理学季刊》联席主编井润田教授。论坛由《管理学季刊》联席主编李海洋教授主持,与会主编分别就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理论贡献的思考、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主要期刊针对中国情境研究的评审考虑、对意向投稿者的建议及期刊投稿情况等方面展开了深入、详细的讨论,并和逾1750位参会学者在

云端进行热烈互动,获得非常强烈的积极反响。《管理学季刊》编辑部根据论坛嘉宾的发言录音,整理成文字,以飨读者。

李海洋教授主持:

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欢迎大家参加《管理学季刊》2020年的主编论坛。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管理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在学习、引进和创新中国管理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多的成绩。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我们也遇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体现在中国企业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非常好的管理实践,然而中国学者在管理研究方面可能做得还不够。因此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学者也都在积极探索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方向。比如在2017年,我和李新春老师在华中科技大学组织了一次《管理学季刊》的论坛,论坛的题目就是《中国管理研究向何处去?》^①。过去三年来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整个社会、经济、企业以及我们个人都提出了很多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管理学季刊》编委会决定举办这次主编论坛,希望

① 李海洋、李新春:《中国管理研究向何处去?》,《管理学季刊》,2018年第2期。

邀请国内、国外顶级期刊的主编和副主编一起来探讨中国管理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机会。这就是我们要主办这样一个论坛的初衷。今天的议程很简单，我们主要有两个小组讨论：一个是英文期刊的主编论坛，另一个是中文期刊的主编论坛。需要说明的是，举办这个论坛得到了《管理学季刊》编委会和战略发展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倾力协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英文期刊主编论坛

池太岚教授（JIBS 领域编辑）：

李海洋老师给出了几个命题，我就从 JIBS 的角度来谈一谈。先提供一些数据：JIBS 的接受率现在是 7%，我不知道其他刊物怎么样，JIBS 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初审拒稿率很高。2019 年是 50% 多一点，2020 年已经达到 60%。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要把有希望的稿子送到审稿人那里，节省审稿人的时间，这样审稿人就能好好审，提供高质量的评审报告，能够帮助有希望的文章进一步提高、改进，最后能产生更大的影响。一个评审周期是两个多月。在这里我想谈几个具体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投稿情况。我还没有看到 JIBS 整体上的最新数据，从我个人负责的领域来看，我没发现和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有什么差异。我个人感觉，由于初审拒稿率真的比较高，导致最近的投稿率有所下降。另外，对中国情境的研究是不是有特殊的考虑？JIBS 没有一个具体的态度和政策，而是把审稿权放到领域编辑的手里。各位领域编辑有自己的考虑或者有

自己的偏好，甚至也可能有偏见。主要是由初审主编（review editors）首先评估一下文章是不是有足够的影响力或潜在的影响力，对文章质量做出总体判断。从中国情境出发做的研究普适性不太高，也可能会影响到初审拒稿率。我没有具体数据，这只是我的猜想，但是 JIBS 强调要有帮助作者努力改进文章的审阅过程，所以我们不要求评审信有多长，但内容要实在，要确实对作者有所帮助。因此如果看到有希望的文章，一般的编辑，不管是领域编辑还是顾问主编（consulting editor），都会努力帮助作者改进文章，希望达到期刊发表的水平。即使文章最终被拒了，我们也希望能够给作者提供很好的评审和改进意见。作为领域主编，也作为审稿人，我感觉到有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比如，从中国情境出发的文章，很多是源于一个研究项目，资助研究资金的机构好像是要强调对中国政策和管理具有应用性。一般在申请资金的时候大家可能强调对中国管理政策有什么帮助，当然强调对中国的应用是有利的，但是在最初设计的时候就可能对这个项目产生一些局限：一个是强调在中国应用的时候，研究结果的一般性可能就被忽视了；另一个是强调指导现实的时候可能忽视了理论，这是我在审稿的时候发现的一些问题。这对申请研究基金的中国大陆学者提出了一些挑战，比如，在申请基金的过程中或者是获得研究基金以后，从一开始的研究设计就跟国际学术理论的前沿紧密地联系起来。如果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没有明确的目标，这样产生出来的结果可能就有局限性。

第二个问题是理论贡献。我经常在一些工

作坊里讲到这个问题。在这里对理论的理解是第一步，理解有深度和广度问题。在审稿人当中，特别是做编辑的这些学者，他们很多人对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很精通的，当然每个人的领域不一样，比如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有时候提的问题也比较深刻。如果作者对这些理论理解不够深入的话，跟审稿人交流就有困难。我在审稿过程中或做编辑的过程中也遇到过这些问题。对于有些审稿人提出的问题作者不知道从何着手，而且作者有时候提出和审稿人意见不一样的修改思路，最后就发现作者对于理论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些情况我都遇见过。当然，还有一个广度的问题。对一个问题的研究，不管是战略管理、国际管理，还是一般企业管理，都有各种理论，这些理论可能是基于经济学、社会学或者心理学。我看到有一些文章经常把不同的理论做一个文献综述，这类综述涉及很多的文章。如何综合起来呢？每个理论都有一整套假设，不同的理论常有不同的假设。那么，这些理论之间是不是相容、兼容？特别是在其假定方面，对人的行为的假定，对分析逻辑的假定是否相容？分析方法是否相容？……这些问题如果被忽略了，就会产生相当严重的问题，这种文章就很容易被拒。当然理论创新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点。我为《管理学季刊》写过一篇文章^①，谈到跟国际接轨的同时，也要有中国的特定情境以及理论贡献。但是有一种倾向是，不管是否其他国家也有中国这样的问题，只要以前没有人做这个地区的研究，我就从零开始做一个新的理论。

其实仔细想想，可能有很多人已经做过类似的研究，也许不在管理学界，而是在社会学领域，或者是在经济学领域，有人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一定要对这个领域的理论特别熟悉以后再投入很大的努力，这样也节省时间，容易提高研究的质量。

最后我就顺着李海洋老师提出的问题，讨论第三个问题：在新形势下会有什么新的问题。现在由于国际政治形势发生的一些变化，有些课题可能会变得更敏感一点。比如知识产权问题、“一带一路”问题，有一定的敏感性。但是研究这种问题也是有利有弊的，JIBS对这些敏感问题特别愿意去探讨。最近我审过一篇文章，研究知识产权的问题，其观点跟美国政府的观点、一些主流媒体的观点很不一样，它用了大量的数据和分析来证明一些问题，这是一个好处。当然也有弊处，弊处是确实要对理论有贡献才行，光是有一个有争论性的话题可不行。另外，我再谈谈审稿人是不是有偏见的问题。西方现在是“种族主义抬头”和“白人至上主义抬头”。在管理学者中，这种人还是很少的，但是也不能说不存在，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当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我在这个领域已经工作很久了，对这个领域的学者大都比较熟悉，所以知道谁可能有偏向。比如有人在 Facebook 上发有偏向的帖子，我可以看到，但是大家不一定都知道，所以找公正的编辑可能会减轻这种偏见的影响。另外就是一些学者对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可能存在误解。在一

① 池太岚：《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管理学研究——再看吸收西方理论和本地创新的关系》，《管理学季刊》，2019年第4期。

个学术工作坊里，有一位从伊朗来的博士生在做报告讲他的文章，我发现他就把政治上的集权制度跟经济制度完全混同，他不太懂这些问题。从这种偏见出发，他会认为中国企业并不是追求利润的，而可能是由政府完全管控的，甚至对市场竞争的结果都有怀疑，当然对数据可靠性可能也有怀疑。因此这就要求从中国情境出发写文章要有一些铺垫性工作，就是要把研究背景介绍清楚，要说得既简练又清晰，这样的话就像在告诉这些审稿人，这就是我要说的

李涌教授 (SEJ 副主编):

我先简单地谈一下 SEJ。这是一家比较年轻的期刊，在我们今天所有谈论的期刊中它最年轻，只有十多年的历史，但它也是一家进步非常快的期刊。今年的 SSCI 影响因子已经超过一些主要期刊。从投稿量来说，因为现在创业正当时，创业研究也正当时，所以投稿量在不断增加。作为一家年轻的期刊，保持质量始终是最优先的考量。因为它是季刊，这就意味着一年四期，每期发表的文章不多，所以它的接受率偏低。从接受的文章来看，主要还是来自美国，另外还有一些欧洲国家。1~2 个月出具第一轮副主编的意见。我现在就针对所提的问题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过去四五年我处理的文章有 10% 左右是与中国有关的，这些文章涵盖了各种各样的话题。既有偏理论的，也有偏实证的。绝大部分都被拒了。但这么多年来在这个期刊我接受的第一篇文章还是与中国有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学者的进步还是非常明显的。

针对中国情境的研究，在邀请评审人的时

候有没有特别的考虑呢？我谈一下自己的一些选择标准。我一般会在理论方面邀请一位评审人，然后在情境或者现象方面邀请一位评审人。如果是做中国方面的研究，我会尽量邀请一位熟悉中国情境的，或者是做过新兴市场研究的，或者至少是做过与亚洲相关研究的评审人。我认为中国学者的优势一般还是在实证方面，但是在实证方面有一个问题容易被忽视，就是取样的问题。很多文章在理论方面相对弱一点。那些被拒的文章，当然会有各个方面的问题，但我认为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研究动机偏弱，就是不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这个通常体现在对该领域的文献不太熟悉，或者是研究做得不深入。研究动机一般要回答几个问题：“What has been done about the topic? What insights have accrued from prior research? What issues remain unresolved?” 如果作者能够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那么评审人通常就会更容易明白。第二个是理论和假设的发展。这方面我发现有两个极端：一是缺少理论基础，刚才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SEJ 强调理论贡献。没有理论基础，你讲的这个故事缺少一个框架，就像人缺少一个骨架。二是对理论的应用不当。就像池太岚老师刚才讲的，堆砌一大堆理论，也不管那些理论的应用是不是能够带来额外的洞见，或者是那些理论能不能放在一起。比如一个经济学理论和一个心理学理论，它们的假定是不是相容。总体上，我认为我经手的中国学者写的文章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个是研究动机比较弱，另一个是理论和假设发展较弱。一般顶级的期刊，首先就是看文章的前面部分，前面部分做得不好的话，后面的实证就失去很

大的意义了。

对于中国大陆学者的建议,我觉得第一个(其实与我刚才讲的有紧密的联系)就是要有洞见(insights, original ideas),要有理论上的贡献。当然我们经常讲理论创新(novelty)。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在探讨理论上比较基础性的东西,即使是复制性研究,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般而言,尤其是做渐进性的研究,需要有很强的研究动机,然后有逻辑清晰的理论和假设发展。第二个,我想特别说明的是,很多文章被拒,问题在于什么呢?一方面他们想要强调文章有理论,另一方面他们想要强调中国的特定情境,但在建构理论或推导假设的时候,又基本忽略了中国特有的那些因素:你给了假设一二三,但在这些假设中好像把“中国”一词去掉,换成另外任何一个国家都行。这样的话,如果说你的贡献是研究中国特定情境下的现象,那么问题就来了。所以,如果要强调针对中国的情境来做研究并且具有一些理论贡献,我们期待在理论和假设的发展中加入一些与中国特定情境相关的变量。

看到大家对于中国本土化研究的讨论,我觉得这非常好。但我个人认为,过多强调针对特定情境比如中国情境的理论,这本身是有矛盾的,因为理论本身要讲普适性。所以,我非常希望基于中国情境的研究发现一些理论上的东西,不仅对中国情境的理解有帮助,而且放到其他的情境之下也能带来一些真知灼见,我认为这是比较好的中国本土化研究。

王鹤丽教授(AMR 副主编):

其实在AMR做副主编三年多以来,我很少收到与中国有关的文章,这可能跟AMR只发表

理论性的文章有关。我搜索了一下过去几十年AMR发表的文章,先是看题目和主题是否包含“China”或“Chinese”,我发现没有,然后就看摘要,还是没有找到。我就接着搜索任何包含“China”或“Chinese”的领域,找到大概20篇文章。这些文章大概有一半是关于文化的理论研究,里面会提到“China”或者“Chinese”,可能因为中国文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大概1/3是关于新兴经济体或者转型经济体的,这里面“China”也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专门进行讨论的。其余的文章就是关于国际商务(IB)、合资企业,还有制度理论或者制度逻辑方面的。我做AMR副主编的这段时间收到的关于中国相关主题的文章,可能就只有一两篇,最终也没有被接受。但是中国学者的文章提交到AMR的会多一些,印象中大概也不到10篇吧。其实这个我觉得也不是特别让人惊讶,因为理论,就像刚才李涌老师讲的,实际上它应该还是比较有普适性的,那么关于中国特定情境下的理论就可能不容易被大家认可。我具体谈谈为什么在AMR上发表中国相关主题的论文很有挑战性,供大家参考。

第一,中国有很多现象虽然是很独特的、有特点的,但是它可能不一定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这里面还有几点是我考虑到的:比如关于中国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哲学(如儒家、道家等)联系起来。在这些文化情境或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确实是中国的一些特定的东西,但是深挖一下,并不一定能产生非常不同的预测。或者审稿人会觉得这个其实也能用另外一种理论进行解释,就

像一些基于传统的价值观、宗教等的理论。这些已有的理论可能并没有和基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有本质的差别。因此应用到管理的情境中,好像只是概念名称换了一下,也没有什么新意或本质上的理论差别。

第二,跟上面讲的有关系,就是学者可能观察到一个现象,觉得好像现有的理论支撑不够,就可以发展出新的理论。但实际上再深入地看一下,我们会发现现有理论只要稍微延伸或者修正一下,其实还是能解释很多现象的。当然这种修正或者说理论延伸也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一个假设,比如说对于人类本性的一些假定,或者是关于经理人行为的假定做些许修正,可能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这样的理论文章是有它的意义的。但是如果现有理论和文章的理论只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基于一些小程度的修正,我觉得这可能产生一篇很好的实证研究,但不一定是 AMR 所追求的那种理论,因为 AMR 对理论的要求更高一些。举个简单的例子,ASQ 的一篇很有名的“关系研究”(guanxi study)文章^①。Guanxi 本身是中国的,但是本质上和很多西方理论中的概念,像社会资本、网络等是共通的。这篇文章大致讲结构洞在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它是一篇非常优秀的实证研究。但是如果写一篇这方面的、专门的理论性文章,可能还是需要更多、更深入的延展。

第三,关于评审人的问题。刚才池太岚老师和李涌老师都有谈到,评审人多数融入西方的情境中,毕竟我们是后来者,不是先发者,所以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会有先入为主的

偏见。因此如果有一个新的在中国情境下发展起来的理论,评审人通常会更严格地来审,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审核观点是不是完全新的,同时还会关注普适性的问题。通常来讲,如果你提出很新的一个理论,比如说基于中国的一些特殊文化,或者是中国哲学的一些观点,可能会受到较多的挑战。即使是在西方情境下,他们自己发展一个特别新的东西一般也会受到很多的挑战。有时候就遇到这种情况,就是特别新颖的文章,可能有的人会特别喜欢,但也会有人特别不喜欢。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情境下,就是在西方情境下也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关于中国的一篇文章,可能这个挑战会更大一些,因为还是会受到一些主观偏见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是后来者,会面临更严格的一些审视。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管理研究要走向世界,最有潜力的一个途径,从长远期来看可能还是从我们中国的期刊,如《管理学季刊》《南开管理评论》等着手。先从中文的期刊开始发表特别有创新的理论,希望这些期刊慢慢地发展起来,然后期刊中重要的文章被翻译成英文,随着期刊影响力的增加,能够被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所认可,从而走向世界。如果真有特别新的中国理论的作品,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更有效的途径。

最近几年我也在做与中国情境有关的研究,想简单分享一些我的看法。国际期刊到底是如何看待中国情境或者中国数据的?很多人都问

^① Xiao, Z., & Tsui, A. 2007. When brokers may not work: The cultural contingency of social capital in Chinese high-tech fir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2: 1-31.

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如果你用中国数据来检验一个通用性的理论，实际上还是会受到很多质疑，首先评审人会提很多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用中国数据来做，相反，如果是美国数据就没人问，这还是个先入为主的问题。即使数据质量比较好的话，还是需要相当强的理论贡献，但这种相对来讲比较难一些。要克服这些挑战，我认为作者需要阐明使用中国情境和中国数据的合理性：第一，理论或者是关键变量是与中国情境有关的。这样就不需要做更多说明，因为理论推演里面就包含了中国的或者新兴经济的因素，而且变量（比如关于国有股权的或者政府关系的）就比较容易说服评审人。因为这是与中国有关的，所以就用中国数据，这种没有什么问题。第二，你的理论比较通用，变量也是通用性的，但是你的中国数据能够提供某些国外数据不能提供的信息，一些变量就必须通过这个数据才能检测，或者说数据的独特性能够让检测变得更好。不管是样本选择，还是其他问题就能够解决得更好，这也能比较好地说明使用中国数据的合理性。

姚咏仪教授（AMJ 副主编）：

我以前当过很多年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APJM) 和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的资深主编。今天特别地说一下 AMJ。如果要在 AMJ 上发表中国研究和在一些 IB 导向的期刊上发表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要求？请注意，发表中国研究与发表使用中国数据的研究可能有很大的区别。在 AMJ，我过去这一年中其实没有

收到很多使用中国数据的研究文章，至于中国研究就更没有了。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AMJ 是非常欢迎 IB 研究的。AMJ 在过去一年有 1520 篇论文提交，今年到 9 月底就提交了接近 2000 篇论文。评审周期（turnarounds）很快，而且它的 R&R 其实也跟 JIBS 等期刊一样，是发展性评审，其 R&R 比例大概有 20%，初审拒稿率为 45%。AMJ 除了强调文章要有理论贡献，还要有实证贡献，以及要有与管理实践的相关性。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AMJ 发表国际研究，它对国际性的定义就是与跨国公司（MNC）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有关系的研究，而且这类文章的引用率还是挺高的，尤其是关于一些一般的 IB 主题。比如外来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这是一个在 IB 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概念^①。另一个是分裂群体（factional group），是 Li 和 Hambrick 的文章^②中提出的，虽然是用中国的数据（中国的合资企业），但是就像刚才王鹤丽教授说的，文章并没有强调“China”或者“Chinese”，而是发展了一个新的概念——分裂群体。这是一个借助于组织人口统计特征的断层线概念而开发出的一个新概念。所以，我的看法是，如果要在 AMJ 上发表中国研究，很重要的就是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中国？第二个问题：你的贡献是什么？可以是理论贡献、实证贡献，以及实践贡献。就后者而言，我觉得在中国的情境里面会有很多的机会。我等一下会说一些具体的例子。

我博士毕业回到中国香港之后就一直在香

① Zaheer, S. 1995. Overcoming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8: 341-363.

② Li, J., & Hambrick, D. C. 2005. Factional group: A new vantage on demographic faultlines, conflict and disintegration in work tea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8: 794-813.

港中文大学任教。在过去将近 20 年的时间,我看到许多中国的学者都有非常好的发表文章的经验。这里我就针对 AMJ 来讨论如何在这个期刊发表文章,怎么样与 AMJ 的社区进行对话,因为在论文评审过程中,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当在做中国研究的时候,你的目标期刊是 AMJ,那么 AMJ 是个怎样的期刊?它跟 JIBS、APJM 不一样的地方是,AMJ 的关注点不是一个地区,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国际相关的主题,而是管理、是组织,所以 AMJ 的受众是广泛的。如果你的研究主题比较窄的话,你也需要做进一步发展。为什么这个特殊情境的题目跟一般想要多了解一点管理、多了解一点组织的受众有关系?他们为什么需要了解你研究的这个题目?而且你做的研究对企业家、政策制定者有什么帮助?换句话说,为何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或现象对 AMJ 社区的成员来说是重要的,而且他们应当需要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在你文章的标题或摘要里面需要明确交代的是:虽然你做的是中国研究,或者你的数据来自中国,但是它跟 AMJ 的读者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们要花时间去看你的文章呢?

正如刚才一位嘉宾也说到的,就是要看看自己的假设,如果用一个中国以外的样本,这个假设是不是也可以成立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假设中,在理论架构(framing)里面,根本就不需要特别强调你做的是个“中国研究”。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你需要考虑用中国特有的一些概念,或者一些样本,那么文章的普遍性

意义又是怎么样的?AMJ 强调,你的贡献在于是不是开展一个学术对话,即在这个 AMJ 社区里面是不是可以跟别人建立一个对话。建立这个对话可能是非常难的,就好像在自己家里,你跟你的孩子沟通时,很多时候他们都不在意,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怎样去取得并保持他们的关注,你跟想要对话的人是不是真正有交流。当然这是需要技巧的。比如,你可以开启一个新的对话。这正如徐淑英教授(Anne Tsui)^①和梁觉教授(Kwok Leung)^②所倡导的,发展本土的、中国特色的研究需要新的概念、新的现象和新的理论。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真的需要做很多的理论发展、很多的实证检验,才能够做得到。

另外,如果你观察到的中国现象是非常独特的,跟外国的或者西方的不一样,那么我们就说在中国发现了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就和现有的对话割裂开来(split the conversation)。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你没有开创一个新的对话,没有跟其他的学者去交流什么是一样的,什么是不一样的,这可能也是一个非常有风险的策略。

最后一个情形是,如果大家有很多不同的见解,那就要将对话整合起来,这个也很难。我认为需要有丰富的经验才可以看得到中国的研究跟西方的研究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另外就是重启一个“老的对话”,做一些重复检验、理论检验的研究,但是在评审人的眼中这样做可能没有新颖的贡献。所以我觉得最可以考虑的

^① Tsui, A. 2007. From homogenization to pluralism: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research in the academy and beyond.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1353-1364.

^② Leung, K. 2007. The glory and tyranny of citation impact: A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510-513.

问题就是,进一步发展一个现有的对话,人家做了什么东西,自己增加了什么内容,在中国情境里面有一个怎样新的知识创造,这个可能比较容易做到。

不少作者可能有很多的实证数据,现在也有很多纵向数据,大数据对获得数据非常有帮助。但是我发现对于作者来说,最难的东西就是他们不太清楚,文章如果投到 AMJ,要创建这个对话,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定位、锚定的文献在哪里。文献可能很一般化,而你的现象可能是具体情境的,必须要找到一个更一般性的管理主题来跟这个主题里面的人交流沟通。所以我认为,如何去识别锚定文献的问题往往被不少作者所忽略,但是这一点却非常重要,因为你必须要知道所贡献的研究“缺口”、增加的价值、边界伸展(boundary spanning)到哪里。发表在 AMJ 的文章,通常都是以一些一般性的、广泛性的概念来作为出发点,尽管作者研究的情境是不一样的,可能是在中国。

那么,什么是理论贡献?我认为主要有三点:第一就是它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式,第二就是填补了我们所知的空白(fills gaps in what we know),第三就是推动了一个领域(advances the field)向前发展,这三个方面我觉得任何一个主流期刊都是非常看重的。

最后,再谈一下在 AMJ 发表的文章中哪些主题可能更多与中国有关。首先是新兴市场战略,我认为这是在中国的作者中做得比较多的;其次就是现在有很多与数据有关的题目,这些方面的数据在中国容易收集到;再者是关于流动性,和劳动力迁移有关;最后就是企业社会责任(CSR)和业务可持续性,这也是最近收

到的比较多投稿的主题。尤其是中国有一些新的政策,还有一些公司披露了很多新的 CSR 实践,所以数据可得性很高。总之,我给大家的问题是:“你的研究以何种方式有创见地丰富了特定领域的现有知识?”当你投稿到 AMJ 的时候,一定要牢牢记住:为什么你在中国做的研究可以开启一个对话?如何跟 AMJ 广泛的受众进行有效沟通?

赵敏渊教授(SMJ 副主编):

我想从一个外来人的角度讲一讲可能前面没有提到的问题。什么叫“外来人”呢?我是从经济学转行的,我读博士的前三年是做宏观经济理论的,所以转行的幅度比较大。一开始转到管理这个领域是有一些不适应的,比如说对于“什么叫理论”,不同领域的界定可能不一样,而刚才几乎每一位嘉宾都提到了理论的重要性。作为 SMJ 副主编,我现在刚刚上任 9 个月,共处理了 24 篇文章,只有 4 篇进入了修改再提交阶段,一开始我还有点不敢相信,怎么会有那么多拒稿!于是跑去问主编,是不是把差的文章都派发给我了?结果他说就是这样的拒稿率。派到我这里的很多文章是中国学者写的,我觉得主编在派发文章的时候不仅是看研究领域,而且因为我比较熟悉中国,所以把有关中国的文章派发到我这里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在做 SMJ 副主编之前,我也服务于其他期刊的评审委员会,包括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Organization Science*、*JIBS*、*Global Strategy Journal*, 还有 SMJ,我自己又在 *Management Science* 上面发表过几篇文章,所以对各个期刊的区别了解得比较多,所以我想从这个方面来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从期刊的差别来说。记得当我刚写

完博士论文之后,开始在市场上找工作,招聘者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理论是什么?”然后我就傻掉了,我完全不知道我的理论是什么,然后每到一个学校,他们就给我出主意,“你可以往交易成本理论上靠;你可以往组织理论上靠;你可以往权变理论上靠”。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背景的人,我想“什么叫权变理论呢?”听到了100个建议之后,我就想“我为什么要那些理论呢?”看了理论,文章改到一半觉得要不我投出去再说,我就投了 *Management Science*,我记得当时的编辑对我说,我们只在意一个清楚明确的故事。你要把那个逻辑说得很清楚,别费那个脑筋套理论了。费那个脑筋还不如把那个故事讲清楚,把实证工作做扎实一些。这之后,我后来发表的第2篇 *Management Science* 文章也还是没有理论。我并不是说其他的嘉宾说的不重要,我想强调的是,理论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期刊有不同的意义。

我的这两篇发表在 *Management Science* 上的文章甚至连一个假设都没有。基本上就是我想说一件事情,然后我看是不是能在实证分析里面发现这件事情。刚才姚咏仪教授说得挺好,就是“*How do I change the way people look at things? How do I change the conversation?*”假如我指出了别人以前没有看到过的东西,那这就是一个贡献。后来经过了那么多年,我觉得“*I hav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I change the way people look at things*”。我讲的是一个别人以前没有讲过的故事,这个就是我的理论贡献。后知后觉好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其实我的文章是有理论在里面的,但是我不一定要套用权变理论,或者交易成本理论。过去多年,我评审

过很多中国学者的文章。我发现有很大一部分文章就是为了“安帽子”而去“安帽子”。结果帽子安得太大,然后实证方面就非常奇怪,因为一定要往那个帽子上面靠。结果评审人就说,不对,你的测量作为理论概念的代理变量显然不合适。为了套这个帽子你去用那个理论概念,结果显得你测量的东西很奇怪,然后理论与实证之间发生错配,换来的结果就是拒稿。这并不是说理论不重要,但这个理论必须是你的故事、你的视角。如果为了套理论的帽子而去套,结果实证跟不上,其实得不偿失。

其次,我想谈谈数据的问题。刚才大家讲了中国的独特情境,我遇到的是两个极端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大量的问卷调查数据。中国的学者有很多接触企业的机会,然后他们就发问卷、收问卷,收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调查问卷。我真是觉得很多美国学者跺着脚说我要是有这样的机会就好了。虽然是非常好的问卷调查数据,但是到评审人的手里,他们会问:“怎么知道这个数据是可以证实(*verify*)的?怎么知道这个数据是可信的?”其实把这个工作做足非常重要,包括很多的总结性统计(*summarized statistics*),而不要着急呈现回归结果。假如你对数据的总结、对原始数据的描述合理,可信度就会增加很多。但是,它仍然有挑战。因为你是独此一家收的问卷,独此一家的结果,怎么说服评审人?这个非常具有挑战性。

我碰到的另外一个极端情况,就是很大比例从中国提交的论文用的是规模以上企业的数据,即中国工业普查数据。因为这个用得多了,数据本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大家也都知道,所以一旦集中在一起,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假

如是独一无二的问卷调查，人家不知道你这个数据是否真实；要是用大家都用，各种问题都已经被剖析得差不多了，然后评审人就说我知道有些人也用这个，他们说这个数据有问题。以前的学者指出的数据局限性评审人都见到了，然后看到一篇新的论文，马上就会把这些放在评审意见里。我不是说要避开这些数据，而是说必须要对它的局限性非常清楚，它在什么问题上面适用，什么问题上面不适用，你必须要比评审人知道得还清楚，把局限性写得很清楚，不给评审人起疑心的机会。其实在这两个极端当中还是有很多研究机会的，很多中国独有的机会。我有一个同事，他是一年能发4篇 *Management Science* 文章的那种人，极其高效，他就是在中国做随机实验。还有一些学者在中国做组织架构的实验。中国有不少公司愿意接受新的管理经验，所以研究机会还是有很多的。

最后想说一下如何应对评审人的问题。你研究的结果是否具有普适性，这是评审人经常提的问题，但是普适性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使研究中国的问题，比如中国乡镇企业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你的新洞见，即在这个情境当中有什么新洞见，而不要太着急地做普适性思考。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文章，包括我自己的文章在第二轮评审中是被拒的，就是在改文章过程中为了要说服评审人我的文章结论有一些普适性，反而把独特的洞见都改掉了。第二轮评审之后，评审人就问，“What’s new? We already knew about this”。“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话我建议还是少讨论普适性，而更多地去强调独特的贡献。你可以说这是依赖于特定的情境 (contingent to the specific environment)，但最终，

就像前面李涌教授也说过，理论是通用的，假如我发现了这个新的洞见，这个新的洞见就是通用的，只是实证的情境是独特的，你必须在这个特定的情境下观察那些关系。假如在别的地方观察不到，很遗憾，我没有那些情境的资料，但是这个理论逻辑是普遍的。

我离开经济学领域20年了，转了一大圈，最终我发现经济学、战略、管理等学科对理论的理解其实是一样的：它指的是清晰的逻辑。你把逻辑说清楚了，无论是用经济学模型还是用管理理论，到最后只要把那个逻辑一步一步说清楚了，你就能够握着评审人的手，让他一路觉得信服，一步步点头过去，其他的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辩的点。我在许多杂志社都待过一段时间，什么都尝试了一点点，自己的研究也是走了一条很长的路过来的，所以就从这个角度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李海洋教授总结：

感谢各位嘉宾，大家讲得非常好！从大家的演讲中我也学到了很多：第一，不同的期刊其侧重点可能不太一样，虽然这些期刊都强调理论贡献，但是怎么去理解理论贡献，可能有分歧。因为有些人可能要“戴一些帽子”，但根本上，其实是关于逻辑的问题。你的文章是不是有一个清晰的逻辑，有一些新的洞见，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二，从方法上来讲，我认为是可信性，你的数据（包括收集过程）是不是可信？你是不是花了很多功夫让评审人觉得，不管你的数据是来自哪里，是二手数据还是问卷调查，你是否真正花了工夫让人觉得你的数据本身可信？你的分析过程可信？你的结果可信？我觉得这可能对很多学

者包括我自己来说都是很有帮助的。

英文期刊主编论坛问答 (Q&A)

问题 1: 同样一篇 IB 的文章投稿至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和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是否需要做些改变, 期刊侧重点在哪里呢?

姚咏仪教授 (AMJ 副主编):

其实我认为好的文章无论在 AMJ 还是 JIBS 发表都是一样的, 但在具体投稿时, 如何构建理论框架 (set up framing) 是很重要的。在 AMJ 发表文章, 一定需要比较宽的、需要联系到一个主流管理学的主题。但对于 JIBS 来说, 由于读者群不同, 其 IB 知识不同、深度不同, 所以是不一样的。在 AMJ 发表文章,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需要首先提到文章的研究动机 (motivation) 与某个一般性的主题可以联系起来, 其次是文章的贡献如何, 最后的启示不仅需要与 IB 领域的管理者有关系, 还需要看是否能够与更加一般的管理者联系起来, 是否对他们有启示? 对于讨论部分, 很多人不太重视, 但其实讨论是帮助评审人和读者看到该研究与他们研究的关系, 是为将来的研究打基础 (build forward), 不仅是与以往的研究有关, 更可能会引导未来的研究。

池太岚教授 (JIBS 领域编辑):

从写作技巧上来看, JIBS 与 AMJ 也很不一样, AMJ 的受众比较广, 而且评审人、读者基本上是管理领域的。但 JIBS 的受众很杂, 有经济学、营销、战略管理等, 所以在写文章时, 需要有明确的读者目标, 比如经济理论, 就要

让经济学领域的人能够看懂, 能够看出贡献。AMJ 则需要让各种人, 尤其是管理学领域的人能够看懂, 看出研究的贡献。

问题 2: “老话题” 在一个新的情境中, 如何有效地提炼理论贡献? 会不会有 “新瓶装旧酒” 的意思? 可否举一个例子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池太岚教授 (JIBS 领域编辑):

SMJ 前两年发表过一期全是复制性研究的内容, 现在不少期刊开始接受有关复制性研究的文章, 但是还得有贡献: 第一, 方法比以前的要好, 纠正以前研究的潜在缺陷; 第二, 把其他学者做的研究方法综合一下, 将更合适的方法用上后, 再看结果是否一样, 这其中可能会有新的理论贡献。

李涌教授 (SEJ 副主编):

举一个例子, 我们讲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的制度一般是欠发展的, 有一系列的原因, 产生一系列的后果, 这方面的文章已经非常多了。现在可以用中国情境研究制度变迁, 中国在过去 20 年, 制度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这就是一个既在情境方面比较有趣, 同时在理论方面, 如果能很好地将制度变迁和中国过去 20 年的情境有机结合起来, 那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比较坚实的贡献。

问题 3: 如何核定数据并使其具有说服力? 是否调查数据越新越好?

赵敏渊教授 (SMJ 副主编):

我从 SMJ 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数据新旧应该不是问题, 但跟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系, 如果是研究一些基础性的问题,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数据还在用, 这应该完全不是问题。但

是假如你要研究的是中美贸易争端对管理的影响,采用2016年的数据,就会有问题。除非有时效性,数据的年份应该不成问题。关于问卷调查数据的问题,现在所有的期刊都允许有附录,你可以添加很多表格,甚至可以把调查的原始问卷加上,原始数据提供得越多,越会让人信服。

问题4: 请问王鹤丽老师,从哪些角度可以找到中国情境的变量?

王鹤丽教授 (AMR 副主编):

一个经常被用到的与中国情境有关的变量是所有权。要去找的变量,需要与你的故事有关系,最好是与你的理论发展或讨论有关,做一个调节变量也好,或者做一个自变量也好,需要把故事揉进去,不能为了加中国变量而加,加的时候当然就是加情境关联度高的,比如政企关系或者文化哲学,佛教或者儒家思想之类的。

池太岚教授 (JIBS 领域编辑):

如果把情境变量作为理论的一部分,就更加有效。比如研究制度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不一样,或者中国不同省份制度的差别。将理论与情境联系起来,那么机会就大一些。

问题5: 对于年轻的学者来讲,在学术生涯早期如何进行理论的训练?

赵敏渊教授 (SMJ 副主编):

我的一个经验是做很多的学术报告,不停地讲,直到把故事提炼清楚。

池太岚教授 (JIBS 领域编辑):

如果是在博士项目上,或者博士项目刚刚毕业,需要花时间去读懂理论,把理论之间的关系看清楚,在脑海中形成一幅图。我博士毕业后又

读了很多书,对经济学研究也感兴趣,还读了很多博弈论的书,做的第一篇文章在 *Management Science* 上发表,评审人相当有挑战性,让我把方法要弄对了,基本的训练没有捷径。

姚咏仪教授 (AMJ 副主编):

中国学者很多时候不太懂得如何和外界交流。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你的想法,你所看到的,所读到的都不要只放在你自己的心里,而是需要与别人交流。做学术报告是其中一种方式,这些都是一种社会学习、一种社会化过程。所以,要多去看别人的文章,要多与你所信任的老师、同学、同事去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学会批判性思考。

王鹤丽教授 (AMR 副主编):

进行交流和思考。多读文献是肯定的。还有两个比较实际的建议:一是读文章,看到文献的缺口在哪里;二是从实践中观察,特别是观察中国情境中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再联系到阅读,看看哪些东西是解释不了的,这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缺口。

李涌教授 (SEJ 副主编):

不光是要多读,而且要精读经典;可以从这个角度考虑一下:所做的博士论文,其中的理论部分、文献综述未来是否可以发表到好的期刊。

问题6: 在中文环境中,如何打造一流的学术期刊,尤其是对《管理学季刊》有什么样的建议?

赵敏渊教授 (SMJ 副主编):

我在沃顿商学院任教时,看着丹尼尔·A. 利文索尔 (Daniel A. Levinthal) 把 *Strategy Science* 期刊慢慢地建起来,还有 *Strategic Management Review*。

这些期刊有很重要的两个特点：一是明确定位，非常清晰地明确定位，要服务什么类型的群体，但不一定是顶级期刊的定位，比如 *Strategic Management Review* 就是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吵”，我们在顶级期刊发表文章，斟字酌句，做得非常小心，缺少一个平台让大家敞开来“吵”、敞开来辩，他们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定位。*Strategy Science* 也是说：我们是管理学者，但多数的管理期刊强调的不是我们想强调的理论体系。二是人，即高质量的编辑、高质量的评审人，一定要有愿意做“坏人”的人，这是我的感觉，特别是在期刊成立的最初阶段，要有一双批判的眼睛，一开始把质量控制做好是非常重要的。

王鹤丽教授 (AMR 副主编)：

有两方面建议，一方面是要开放，如果有新的想法 (idea)，可能其他方面不太成熟，一定要对新想法保持开放，这是一个基础。另一方面是实证研究要强调可信性，相对于贡献而言，可信性更重要，要做可信且负责任的研究。

姚咏仪教授 (AMJ 副主编)：

很多中国甚至亚洲的管理学者，把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当作一个梦想来努力，MOR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和 APJM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虽然用英文出版，也是类似的例子。要达到国际水平会有很多约束条件，影响因子、期刊排名等这些已经界定了顶级期刊的标准，我觉得很难去打破，而只能接纳这样的标准，如果要追求这个梦想，一定需要有一些突破性的思考者 (groundbreaking thinker)，真正对中国管理有贡献的

思考者，他们愿意将最好的研究成果投到这个期刊，不考虑其是否有影响因子，或者排名如何。只有认真地思考中国管理需要什么东西，即使其他的顶级期刊不会发表，你的期刊却可以发表，做到对中国管理研究有独特发现的时候，这个目标自然就实现了。

李涌教授 (SEJ 副主编)：

好的期刊首先是文章质量要好，这个很重要，宁缺毋滥。团队也非常重要，以 SEJ 为例，过去十多年来，SEJ 应该是管理学期刊中质量提升最快的期刊之一，十多年前就进入了 FT50，被越来越多顶尖的学校所看重。它的创始主编之一也是 SMJ 创始主编丹·申德尔 (Dan Schendel)，后来又有杰恩·巴尼 (Jay Barney) 等在战略或创业方面很有建树的一些学者加入。另外，在选择副主编和编委会成员时，非常看重这些成员的研究做得好不好。发表文章的篇数、文章引用率当然很重要，但这样的学者可能有很多，所以还要看这些学者所做的研究是否扎实。SEJ 非常注重编委会的发展。我们最近有幸邀请到密歇根大学的吴迅加入副主编行列。所以打造一流的学术期刊，编辑团队需要不断增强。

池太岚教授 (JIBS 领域编辑)：

一开始鼓励人们将最好的文章送到新的期刊发表是不容易的，在把握质量时就得灵活一些，比如一篇文章送到 SMJ 或 AMJ 或 JIBS 被拒掉，可能数据上有一些缺陷，可能普适性不够，或者不是最好的测量，但是文章想法很好，很有创新性，只要是可靠的，这种文章发表后，可能会扩大影响，提高期刊文章的引用率。

中文期刊主编论坛

白长虹教授（《南开管理评论》主编）：

各位的分享非常有帮助，刚才英文期刊几位主编的发言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非常难得，可以有机会与各位研究者一起在“云上”对话、交流，我就中国管理研究怎么面向实践转型这个话题谈点自己的看法。前段时间《管理世界》李志军社长发起了这一问题的讨论，引起了热议，我今天继续就这个话题谈一点想法。

管理学研究面向实践转型的目的很清楚，就是鼓励大家做好的管理研究、创造好的管理理论。关于好的研究，管理作为一个实践性、应用性学科，扎根实践、解释实践、引领实践，就是好研究的主要特征。作为好的理论，应该回应真实的问题，能与已有的成熟理论形成融贯的关系，对解决实践问题是有用有效的，理论表达是简明的，这些是我认为好理论具备的几个特征。

今天谈面向实践，我们研究中国管理最大的一个背景是：十几年来一批中国企业在管理创新方面做出了成就和成果，如海尔的人单合一模式、华为的流程性组织等；一批企业通过创新探索赢得了显著的竞争优势，而且展现了新型管理思想和经验的力量，成为企业界学习的对象，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大地上有很多企业在进行着管理创新的探索，他们或许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是被繁忙的事务、繁杂的信息淹没了，探寻这些宝藏让他们发出应有的理论光芒是管

理研究者应该承担的任务，也是管理学面向实践转型的机遇所在。但是迄今为止，这些成果还是没有得到有效的扩散，就是说在理论的总结上还是有欠缺的。究其原因，一是这些创新成果本身不是一瞬间思想顿悟的结果，而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生成雏形，又经过不断的实践得以完成。二是目前一些实践研究成果主要体现结构或者流程的一些外显特征描述，不足以解释深刻的实践逻辑。实践逻辑跟一般性原理或者一般性理论不同之处在于，理论表达往往就是概念、新概念发展或者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即理论模型，这些概念都有明确的定义，关系也可以被清楚地描述，一个好理论的描述往往有着非常强的证据。而实践逻辑有时可以呈现为显性的知识，被清楚地描述，有时却隐含在管理的行动当中，以默会知识的形式在多种关系或多变情境中才能表现出来。从一些成功企业的情况来看，实践逻辑本身是具有稳定性的，能够有效地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带来绩效，同时也能够为一些意外的情况甚至突发事件提供一些常态化的处置方式，如面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一些先进企业能做得很好。实践逻辑能够对一些重大问题或者主次问题给出解释，为管理决策提供支持，更重要的是这些逻辑在组织内本身是可以传承、可以复制的，否则这些创新成果就无从谈起了。

管理创新从实践逻辑上是可以认知并且可以被其他组织复制学习的，它需要一个理论研究、理论发现的过程。那么学界的研究应该尽量完整、清晰、深刻地展示实践的逻辑，这种研究首先要说明管理创新的核心理念、原理到底是什么，和人们已经熟悉的既有原理在哪些

方面是背离的或者对既有原理做出了哪些修正。刚才几位海外主编在谈到中国管理研究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中国的情境跟既有理论的对比关系。新理念或者新原理与实践逻辑的关系也是我们要探查的东西,这些理念或原理是通过一组实践逻辑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而有关的研究应该去说明实践者在这种逻辑驱动下,在什么情形下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决策,比如组织内部是如何分工、如何协作、如何进行业务控制的。Tik Tok 在海外的发展到底内部的组织形式是什么力量、什么方式?这都是我们很感兴趣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进一步去研究实践者在变化的情境中如何践行这种逻辑,在复杂的关系中如何建立起新的适应性连接,这就需要我们的研究者用深描的方法力求阐释出那些默会知识中的内涵。通过对管理实践在不同情境下的反复观察,识别出实践逻辑中可创造性和可延续性的内容,使学习者包括企业的学习者和我们的学生或者其他的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进行再创造,使创新得以扩散。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不久,2020年3月26日哈佛大学商学院网站上发布了一篇哈佛商学院学者观点的汇总文章,关注疫情带来的新变化,比如新型冠状病毒如何改变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关键词包括了很多东西。

我举这些例子是要做一个总结,今天在面向实践转型的时候,实际上有几个主要推动力量:一是中国企业的不凡表现,目前按照“独角兽”企业数量的统计,中国和美国基本上是并驾齐驱、遥遥领先,占据全球500个“独角兽”企业的80%,大体上是200多家。二是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类似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三是技术革命、新的工业革命带来的一些变化。此外,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力量就是管理学者的深刻反思。

目前在管理研究实践转型方面存在的一个主要障碍因素在研究方法上。我们收到的不少论文其量化研究很多假设实际上是常识化的,换句话说通过观察就可以看到、认识到,或者干脆偏离现实,而且一些操作性定义过于简化,它的量表与概念是脱节的,实证方法单一。在质化研究方面,格式化的现象严重,一味套用方法、证据链脆弱、缺乏高质量的分析,对研究发现所进行的理论探讨与分析常常是简化甚至敷衍的。当然中国管理研究毕竟有一个大的学术环境在那里,受限于评价机制、受限于现在的学术风气、受限于理论和实践的割裂。尽管几位国际期刊主编很羡慕中国学者可以扮演导师角色带着学生做,但总体氛围并不良好。当然这也跟期刊的导向有关。为此,在推动管理研究实践转型方面,《南开管理评论》做了一些工作。

我们通过“主编寄语”不断地提出面向实践的导向论述,来提示《南开管理评论》的办刊定位,比如好理论的特征、关于问题导向、调研方法等。我们设立了评论栏目,对于有好的研究想法、有好的理论建构但可能在数据论证或方法上面有瑕疵的文章,给予特别对待,避免被严密、严格的评审流程给屏蔽掉。我们也加强了对重大项目的约稿和一些主题征稿。

好期刊一定要有自己鲜明的定位。《南开管理评论》的定位是“面向实践、面向未来”。面向未来很好理解,我们欢迎针对管理的趋势性、方向性的一些研究和成果;面向实践是我

们今天谈的主题。我们也努力加快审稿速度、提高质量、扩大容量,通过专业主编互相协作回应实践转型这一时代课题。

乔晗教授(《管理评论》副主编):

非常感谢《管理学季刊》的邀请,让我有机会与青年学者们探讨新形势下中国管理的研究与发表。刚刚也通过交流学到了很多,前面几位英文期刊主编和白长虹主编的发言都让我受益匪浅,也特别期待后面听到井老师、李老师的高见,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管理评论》成立于1989年,是管理学领域的综合性中文学术期刊,论文发表的范围既包括管理学各分支领域,也涵盖经济和金融领域。2015年7月,《管理评论》首创“案例研究”专栏,每月固定发表两篇案例研究论文,用于支持基于中国情境的案例研究、鼓励学者们通过案例“讲好中国故事”、建构中国的管理学理论。案例研究属于质化研究方法范畴,因此《管理评论》对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论文都是欢迎的。

一般来说,期刊评价一篇管理学论文,有六个评价维度,分别是选题意义、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结果分析、理论贡献以及实践启示。

第一,从选题意义方面看,《管理评论》响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号召,管理学者们要做“顶天立地”的研究。一个好的选题往往有四个特性:新颖性、重要性、实用性和有趣性,其中前面三个特性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能在前面三个特性的基础上研究还具有有趣性,那就更好了。《管理评论》主编汪寿阳教授经常强调研究的问题导向性,一项好的研究应该选择新

的、重要的并且对管理实践有指导意义的问题,而不是单纯强调新问题。研究有四个层次:新方法解决新问题、旧方法解决新问题、新方法解决旧问题、旧方法解决旧问题。好的研究往往是问题导向的,在研究新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已有的方法不好用,需要提出新方法来解决这一特定问题,运用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的研究由此而生。

第二,从研究范式方面看,研究范式事实上是在初审环节拒稿比较多的一个原因。我们要看研究范式是否适合《管理评论》。研究范式可以是思辨的、可以是解释性的、可以是演绎性的,还可以是分析性的。但是无论采取哪种研究范式,都需要与经典的理论进行对话。学者库恩专门提出了研究范式的四要素,这四要素包括了专业的研究群体、共同的研究问题、达成共识的基本假设以及通用的研究方法。刚才敏渊教授提到了一个问题:不同的期刊对理论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其实这也代表着不同的期刊所要求的研究范式是不一样的,因为读者群体和作者群体可能都会有所不同。《管理评论》要求研究是要有研究范式的,选好了问题之后不能只进行现象的探索,学术论文是要遵循研究范式的,并且要与经典的理论对话。

第三,《管理评论》对研究方法也是有要求的,但是我们不强调一定要有数学模型。比如,质化研究就是不需要数学模型的,但它依然是一种标准的研究方法。像质化研究、量化研究、实证研究、数理模型研究、案例研究等,《管理评论》都是欢迎的。在科学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方法的要求是要选择适当,选择适合研究问题的方法;同时研究方

法要严谨，研究设计要合理。

第四，从结果分析方面看，我们会审视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否正确、是否合理。同时我们很关注数据的可信性和真实性，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是否别人用这些数据也能得到一样的结果，其稳定性是否可被再次检验，审稿专家有时候会要求作者提供数据，希望能够复现研究结论，并且看一看这个数据来源是否严谨。期刊始终认为研究结果要能够被验证，是可以被再次检验的。反直觉的结论也是期刊欢迎和关注的，但是反直觉的结论要能够给出有说服力和自洽的解释，如果是在研究中发现了反直觉又能够合理解释的结论的话，反而被认为是一个好的研究结果，同时对于结果的分析 and 解释要清晰到位。

第五，学术研究要有理论贡献。评审专家希望看到作者与经典理论进行对话，在此基础上判断一篇学术论文中是不是包含一个全新的理论建树，如果是的话，那么它的适用性如何，未来的可扩展性又如何？如果不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建树，论文研究是否有重要的理论突破？填补了什么样的空缺或者有什么指导意义？如果论文没有特别重要的理论突破，但是有理论创新，那是做了什么样的拓展和延伸？这些拓展和延伸的应用价值是什么？期刊会从这些角度判断管理学论文的理论贡献。

第六，实践启示。在期刊初审时就会审核研究结果是否真的有实际的应用价值，基于论文的研究结论是否可以给政府部门提供一些政策建议作为参考，至少是关于政府部门要怎么做，是要能够落地的结果？企业或者组织应该怎么做？高管团队应该怎么做？项目组或者是

工作组应该如何做？企业中的员工应该怎么做？……这些问题，都是判断实践启示的方法。期刊经常会收到有非常好的、非常漂亮的模型研究论文投稿，但最终结果缺乏管理学的启示和讨论。这种应该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太数学化的模型文章。其实从管理学论文的角度去评判的话，我们觉得模型是一种方法，当然是可以用的，而且现在是比较多地被应用，但是重点不在于模型是否建得美轮美奂、是否高深，关键问题是要用合适的方法，哪怕是很简单的模型，如果可以得到引人深思的结果和有用的结论，那么也是期刊所认可的。

《管理评论》鼓励学者们基于中国情境构建新理论，讲好中国故事，但是我们强调研究要有科学通用的研究范式，要和国内外的经典文献对话。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光与中国的文献对话，而是也要能与国外的经典文献对话，这样才能够有利于我们的理论传播，有利于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理论向外传播，要用中西方学者都能听得懂的声音去讲话，才会更有利于中国理论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李志军教授（《管理世界》社长）：

各位上午好！很高兴参加《管理学季刊》组织的这次论坛，见到了老朋友，也认识了新朋友，所以很高兴！刚才听了各位海外的朋友还有国内的同行的发言和讨论，我很受启发也很有收获。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国内的管理学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很好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现在大家也都有一个共识，国内的管理学研究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在研究内容上有

很多研究是不接地气的,没有很好地总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管理方面的实践和成功的经验,有一些研究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我看到过有些文章讲银行高管的脸部长宽比例对一些情况的影响,我觉得这样的研究没有什么意义,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研究方法上有些是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有些研究数学化、模型化的趋势让人担忧,有的学术期刊也是全然走了样子,这也就是《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编者按”的一个要义,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第三点,我觉得国内有一种崇洋媚外的现象,照抄照搬国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国内问题的一些好的、高质量的文章都到国外去发表,给国外交版面费。中国知网有个统计数据是每年交10多亿元版面费,北京工业大学有一位教授研究说不止10多亿元,而是上百亿元,反正是有一笔很大的经费作为国外杂志的版面费;反过来,国内的期刊缺少优质的稿源,也不允许我们收版面费,所以这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影响了国内期刊的发展。

我认为中国未来管理学研究要重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要学习西方管理学研究的理论方法。第二个方面是要吸收中国历代管理方面的优秀成果,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积攒下了很多管理方面的经验,我知道国内有人研究中国古代的管理学、东方的管理学,都有很好的成果。第三个方面是应该要研究中国现实的问题,习总书记讲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我们要研究中国现实的问题,为中国企业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这也就讲到了学者的责任,即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感、时代感、

使命感,在这个方面期刊实际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所以我们要倡导研究中国问题,讲中国的故事,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的现实的管理学问题;我们提倡研究范式要规范,研究方法要多样化,一个研究成果要提出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体现出有学理的新的理论。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已70多年,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取得了伟大的成就。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在实践当中蕴藏着巨大的理论创新动力和活力,我们要研究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为管理学创新贡献中国的智慧,实际上中国是最好的“实验室”。我们的企业形态丰富且各异,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家族企业、外资企业,为管理学思想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和鲜活的样板。我们应该好好地总结、提炼,把实践的经验上升到理论、上升到系统化的理论。中国企业的变革也是在国际化的进程当中,有一些企业做强做大,进入了“500强”,比如说《管理世界》与中国人民大学毛基业教授做的“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已经举办了13届,今年是第14届,都是研究中国本土企业的管理案例。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很好地研究中国的这些实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这种大的舞台、大的背景为管理学的创新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基础,作为学者应该抓住历史的机遇为世界贡献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智慧、中国在管理方面最好的案例。比如说这次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在应急管理方面得到了考验,也提供了一些很好的经验。现在很

多新的业态包括网上服务、网上购物、网上讲课,还有网络会议等一些新的情况、新的形态都出来了,我们要很好地去研究、去总结。

我们要重视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总结,反过来拿这些理论去指导企业的发展,指导经济社会的发展。要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使理论和政策创新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要做很多的调查研究,现在很多的研究不深入,深入不到企业里去。我们可以看一下过去像费孝通先生做乡村经济的研究,深入中国农村去住上几个月、半年做研究,我们做企业的同志是否能到企业里去挂职,到企业里去工作一段时间呢?我认为现在很多的研究还是浮在面上,特别是大学一些教授没有很好地扎根中国的实际,包括比如现在大家研究较多的中国农村问题,但是有多少人真正到中国农村去看一看、走一走,在那里住上半年、几个月,了解农村的问题呢?这也是乡村治理、乡村振兴过程中一些很现实的问题。

另外,我觉得吸收西方的理论没有问题,但是必须要体现中国的一些思想、世界观、立场方法。我们一般讲自然科学的研究是世界性的标准,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比如管理学的一些研究还是有意识形态的问题和导向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重视这件事情。

张维教授(《管理科学学报》主编):

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跟我的同行和潜在的读者群和作者来交流。

《管理科学学报》的中文版,是从1986年开始的,到2016年有了英文版,但英文版领域要窄一些。中文版和英文版都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合作主办的,也都是采用国际

通行的双向匿名评审的审稿制度。当年成思危先生做主编时确立的一个愿景,就是成为管理科学家发表中文代表作的的首选,我们还要继续为之努力。刚才大家谈了很多一般性的问题,我就不说了,大家可能都差不多。

今天讨论的一个主要的话题是如何鼓励与实践相关的选题,实际上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都非常鼓励源于实践的研究选题。在英文版中,我们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因为与其他已有同类刊物相比,它要有一些特点,所以特别鼓励面向实践、交叉性学科的新颖观点。这两份期刊既有理论文章被接受,也有实践文章被接受,这两种类型的文章在技术文章上是比较主要的。我们也有少部分是具有评论性风格的文章。

讲几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去鼓励面向中国实践的研究。从工具上来看,主编会邀请专论文章,以凸显学者对于一些面对实践发展动向的思考和洞察认知。另外,在2019年,我们配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改革,推出了一个相关的系列研究专题。最近,我们计划设立一个新的专栏,并与其他期刊一样也有一些专辑的考虑,我们邀请有影响力的领域专家来做合作主编,就一些重大的实践动向形成相关的主题。2019年我们做了大概三个主要的专题,并配上一些讨论性的文章,都是邀请了国内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管理学家。我们准备2020年或者是2021年开始推出“管理科学前沿与探索”专栏,期待有一些新的思想、新的观察、新的思考的文章被推出,它们有必要的分析逻辑、数据和文献支撑,但从一个完整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形式化的模型或者非常严密的论证,但是它具有思想

性,因此想通过这种形式来加以推出,推动与实践的结合。

关于专辑,2020年我们要做的是大数据与管理的问题。大数据或者说互联网时代,造就了很多新的东西,我们邀请香港中文大学贾建民教授和清华大学陈剑教授来当客座主编,试图在这方面反映中国管理的一些前沿的东西。在英文版中,我们也做了一些专辑,有些已经刊登出来了,有些是正要发表的。比如中国的大型工程项目有很多而且都是世界级的,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经验以及相应的一些研究积累,我们邀请南方科技大学黄伟等三位教授一起来做客座主编。另一个例子是关于都市交通的,在大数据时代、分享经济时代也有很多特点,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实践也是如此,我们邀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黄海军老师和香港科技大学的杨海老师来做这个专辑。此外,我们还邀请了肯萨斯大学的 Zongwu Cai 教授等和香港城市大学的 Leon Zhao 教授等分别就两个不同的专题做英文版的专辑:一个是关于中国定量经济研究40年的回顾,另一个是关于目前中国发展比较热的金融科技方面的研究工作。

第二个问题是面向管理实践的时候还有哪些问题和障碍。前一段时间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组织专家做“十四五”时期战略研究时,我们梳理了一些我国管理学科目前发展的不足和问题,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若干制约因素。我们认为,这些约束一部分是外部的、体制性的约束,也就是来自环境的约束;另一部分是来自我们研究者自身的一些局限性。大家可能都知道,其实有一些外部的因素、体制性的安排(比如学术考核的评价机制、学术影响力的评价

机制等)还比较僵化,当然现在正在改变,不过还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另外是中国商学院中做基础性的管理科学研究,其资助模式与在发达经济体中商学院的资助模式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可能更多依靠一些竞争性项目形式进行资助,所以大家都要去申请项目。不同的项目之间是有区别的:一是它们的渠道和定位不一样,而这些渠道可能有些地方不太协调,有冲突的地方;二是在项目的类型设置上可能也不太一样,跟我们在做研究的本身工作相比可能不是一一对应的,所以就造成了一种比较扭曲的现象;三是高质量的数据资源短缺,虽然我们一些公共研究数据资源得到积累、开放、共享,但这些方面还依旧存在一些比较薄弱的地方。

如果要列举下去,可能还有一些因素,但这些可能是比较主要的。

除了这些来自外部的制约,还有来自研究者自身的一些约束。我们对学科特点的认知其实彼此是有差异的,不同的人可能从不同侧面看同一个问题,这需要我们很好地去进行思考。同时,对于一些需要长期探索的、不确定性很大的研究,大家都不大愿意去触及,因为考虑到职业风险,再加上由于现在的一些制度性约束,其实很多学者不太敢做这种事情。此外,我们的研究视角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文化的多样性、学科多样性上看还比较欠缺,特别是不太习惯站在全球视角上来看中国实践的一些本质性的规律,这个可能我们需要有一定的转变。

第三个问题是怎么看待中国本土研究的理论贡献。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挺简单,如果所有的科学研究结论一定都是建立在假设基础

上的,那么也可以把管理研究的情境看成一种非常复杂的假设,包含很多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观念、技术发展状态等,这些都是扭结在一起的,有的时候还不太好显性表达,甚至在研究的时候被遗忘掉了(倒不是说一定会有意遗忘,而可能是根本没有意识到),但是管理研究的结论其实都是建立在这些情境或者假设性基础上的。所以,我们才常说,管理活动规律与情境是相对应的,才有了本土和普适的问题。按照自然科学的研究说法,通常的表达方式是如果有A,那么就会有B。在这里,B就是结论、A就是情境或者假设。其实,所谓的本土研究要么是扩展了情境A、要么是提出一个新的情境A',然后得到了另外一个结果B'。如果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能回答这个所谓“本土化”的问题。

在此,给有兴趣投稿的学者提出几点建议:

最近大家一直在强调我们要做负责任的研究、做社会的研究,这其中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具有相关性,二是要非常严谨。自然科学基金认为科学的发展来源于实践的驱动、来源于科学家的兴趣;对于管理学而言,更多的是来源于实践需求推动的科学研究,那么就需要我们从实践出发,抽象出需要研究的学术问题,然后看看这些学术问题的解答是否能够对于实践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我觉得,学术研究结论不一定马上或者直接能够去解决某一个实际问题,这可能更多的是咨询公司在做的事情,但你一定要从实践问题出发再到抽象出学术研究问题;或者从学术文献的薄弱点出发找到研究问题,但一定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是否具备影响实践的潜质。在帮助大家的选题方面,北

京大学的陈春花老师曾经提出一个“两出两进”的模型,上次在广州的一个战略研讨会上报告过;我自己提出一个螺旋模型,在博士生课程中也一直讲授,大致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从实践出发,看看能够出现什么科学问题;然后去看文献,看看这个科学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如果前人没解决,那你就做这个研究;如果解决了,那对不起,你得再回到实践去重新寻找研究问题。当然你也可以从学术出发、从学者的好奇心和兴趣出发,但一定要看看现实里有没有与之对应的问题,如果有,你可以去做,因此它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眼界放大一点:我们研究的无非就是管理活动有哪些规律,如果与理论相冲突,就会出现一些异象,那么异象是怎么来的,一定是与管理活动的一些构成要素有关系,这些构成要素可能会受到若干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去找这些东西,看其异象,最后就会得到一些新的规律,这是理论发展的一些基本逻辑。

前一段时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在做“十四五”时期学科发展战略时,专家们经过讨论大概划分了当今时代推动管理活动规律发生变化的四大类重大影响因素,每一类可能都会产生一些新的管理研究的新问题。对作者来讲,发表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不重要,重要在于研究的是什么;甚至有的时候我在想,研究什么都不重要,为什么研究更重要。把这个事情想明白,其实有好的发表也不是难事。

在最近的自然科学基金的战略研究中我们有一些思考,现在强调的是从中国管理实践出发,基于这样的管理进行研究得到一些新的原创理论,对全人类的管理知识有所贡献,这是

我们希望得到的结果。同时如果基于一般的管理实践研究做一些理论的工作也能产生影响,只不过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强调这个大的方向而已。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论的创建应该是对全人类的管理知识有所贡献,如果结论是非常局限的,可能会被认为一般化的意义没有那么大。其实,科学家或者学者总是试图追求某种普适性。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给定一组假设、得到一个结论,然后放松假设、得到一个更一般的结论,使结论更普适化,这个就是大家都在追求的。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科学家做着做着就变成了哲学家,因为哲学被认为能够比科学的解释更一般化;甚至,有的哲学家做着做着就变成了神学家,因为他可能认为神学对于世界的解释会更一般。当然这是开玩笑,但却反映了这样一种基本的逻辑。

井润田教授(《管理学季刊》主编):

《管理学季刊》的定位是比较清晰的,其发展历史在今天参与讨论的五本中文期刊里是最短的,即使从原来的《中大管理研究》开始算,时间也不长。更名《管理学季刊》后,首刊于2016年6月刊出,《管理学季刊》本身在诞生时的定位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刚才听了几位英文期刊主编的意见之后,总体上来讲,我的切身体会是中文期刊的存在特别重要。因为像国际期刊都特别强调所谓理论的普适性,敏渊教授刚才讲到,文章要有逻辑,但事实上从理论研究来看,从本质上来说,像卡尔·维克(Karl Weick)也讲过任何理论其实都是所谓的普适性、精确性和简洁性的一个折中,不可能

把三件事都做好,那就意味着当我们追求非常高的普适性时,可能会给当地的情境实践甚至理论的简洁性带来一定影响。刚才几位中文期刊的主编像白教授讲到的实践逻辑,像乔教授讲到的实践的指导意义等,我们都高度强调实践,尤其在当下的中国,倡导“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显然这个实践不容忽视,当然在英文期刊中大家也会讨论这个问题:理论研究对实践到底有多大的启示意义?因此从这点上来说,其实在中国或者本土情境中,期刊显然需要能够平衡理论研究的三件事情本身存在矛盾的目的。相比其他四本期刊,《管理学季刊》的定位很清楚,就是聚焦于战略、创新创业以及组织研究领域,或者就是稍微宏观一点的企业管理的研究。当然,我们定位本身也是希望能够在在中国的情境中推动理论的发展。应该讲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一直在为期刊的定位做讨论,也做了很多的反思。一年以后,在2017年的武汉会议上大家就再一次讨论这样的定位到底对不对,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话是否真的需要解决实践相关性等这样一些问题。这样的讨论也在《管理学季刊》发表了出来^①,所以我们一直在为《管理学季刊》的初心做一些讨论。

2019年,四位创刊主编把主编的接力棒交给我们三位,当然海洋教授一直在担当联席主编,那个时候还一直在思考期刊的发展问题。另外,在2019年特别重要的是成立了《管理学季刊》的首届学术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希望能够在整个期刊发展的更高层面上提出导向、定

^① 李海洋、李新春:《中国管理学研究向何处去?》,《管理学季刊》,2018年第2期。

位等。因此《管理学季刊》从刚开始诞生到发展过程中一直在为定位做清晰的规划，当然也有组织上的保证。

《管理学季刊》在本土情境、本土研究中到底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做法，我与海洋教授、玉利教授也做了一些讨论，总的来讲，我们一直在坚持这样几个原则或做法：一是坚持开设整个《管理学季刊》的特色栏目——名家约稿，约请在整个管理研究领域中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的国内外学者。即使是名家约稿，其实讲的很多问题还是针对中国研究的；反过来讲，在中国的研究情境中，在追求理论普适化的同时，也确实需要一些情境化的贡献，在中国情境中研究新兴经济，包括中国的独特的研究到底意味着什么，另外，像“家长式领导”这样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的本土概念的研究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等。目前我们的名家约稿已经完成了16篇文章，这些约稿在整个公众群中，包括我们的期刊论文中有很高的引用率，即使是海外的一些学者在谈中国研究，他们也会谈到在中国的情境中我们怎么样去从事更好的研究。因此从这点上来说，我们既是一个希望能够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期刊，同时也一直在坚守本土情境的初衷。

二是和张维教授刚刚讲到的一样，《管理学季刊》也一直在办一些特刊，从2016年到现在，也就只有4年的时间，我们已经办了七个特刊，最主要的就是回应当下中国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包括家族企业、“一带一路”的国际化等在中国情境中很重要的研究问题，如医疗创新、商业模式、数字化等这样一些特刊。整个特刊收到了61篇稿件，刊登出7篇，另外还

有两个特刊目前正在评审和发表阶段。

三是《管理学季刊》还有一个特点，在特刊征稿之外，我们本身有一种比较大的国内外的评审委员会，因此差不多每一次的特刊，都会举办一个专门的专题讨论会来帮助作者改进论文，帮助作者改进论文的方法也得到了很多作者非常好的评价。今天下午，由梁建、黄旭、陈威如和陈志俊四位教授负责的特刊“数字时代的工作设计和组织转型”会举办这个活动，因此，《管理学季刊》其实一直在做着与作者群体对话的事情。不只是简单发表，而且希望通过这个过程能够帮助作者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这是《管理学季刊》的另外一个做法。

从期刊论文的发表上来看，在研究中国本土问题时，如果对一种现象或者对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就说要和什么普适性的理论来对话显然是很难的，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定性研究包括案例研究在这中间显然会非常重要。从2016年到当下投稿《管理学季刊》的论文中定性研究（也包括QCA的一些方法）所占的比例平均下来是27%，应该讲还是呈上升的趋势，这个比例相比刚才几家英文期刊来看，大概翻了一倍多，像AMJ、ASQ这样的期刊通常定性的论文大概只占到12%，因此刚才我看到也有作者在问是否可以更鼓励做这种定性研究。几位中文期刊主编刚才都讲到实践导向，我相信大家对定性研究的重视也达成了共识，因此通过鼓励定性研究希望能够真正实现像刚才李社长讲到能够贡献一些在我们中国的独特情境、文化中有价值的一些新的理论，那么这也是《管理学季刊》在办刊过程中一直坚持的

一点。

我之前搜寻了一下 CNKI 数据库, 查找《管理学季刊》高引用的 20 篇论文。我发现这 20 篇高引用论文, 无外乎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这些论文可能回答的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 但一般性的问题反而不像 AMJ 这样定位于广泛的理论贡献, 可能就是在方法上或者方法论上的贡献, 像王宇、李海洋教授这篇内生性的论文其实是引用最高的一篇^①, 像刘东、刘军关于实践理论的研究的新的方法^②, 包括像贾良定老师等讲到的怎么样去做调节变量^③, 梁建老师等讲到的关于量表的开发^④等, 这些都是在方法或者是方法论方面的一些贡献。另外一个非常独特的是这些高引用的论文通常都是在中国情境下目前出现的一些特别重要的现象或者是一些研究的问题, 像平台在整个高引用中明显占有优势, 研究平台组织是中国情境下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后发企业也是中国情境下的一个现象;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研究这种制度等, 往往都是和我们中国的情境特别相关。其实像刚才几位海外的主编也讲到的, 这样的论文如果要想在这种一般性的、国际性的、好的英文期刊上发表, 就特别需要想办法去处理情境的问题。恰恰在《管理学季刊》中我们看到, 这其实是大家喜欢这些论文, 愿意去看这些论文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因此, 在《管理学季刊》目前来看, 高引用的论文通常有这两个特点, 我们也特别鼓励今天线上的读者

群或者作者群, 大家以后也就知道《管理学季刊》有这样一个所谓的风格或者特点。

另外, 《管理学季刊》于 2016 年 6 月首发(第一期、第二期合刊), 到 2020 年 6 月一共发表了 298 篇论文, 这其中包括像“名家约稿、评论”这样一些短文。这 298 篇论文, 按研究的主题词大致可以划分成四类: 首先是创业或者创新, 然后是组织或者是战略的问题。另外非常独特或者重要的一点, 刚才所讲到的中国的管理问题一直是《管理学季刊》特别重要的一个特色, 在这方面中国情境、中国实践、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等一直是特别重要的关键词; 另外还有特别有趣的一点是, 在我们发表的论文中, 有很多的论文特别讲到了关于中国的学术社区的一些建设, 《管理学季刊》在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我专门把当时的四位创刊主编作的发刊词拿出来, 可以看得到当年在发刊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研究场域中, 需要有自己的学术平台, 特别是还需要有一些更加专业化领域的一本学术期刊, 最后这一段现在来看依然让我们特别受鼓舞: “本刊以公元 2016 年作为始点, 是国内与海外战略管理、创业、创新领域华人学者在以上共识基础上做出的一次重大行动。我们期望以此学术平台的搭建为契机, 创立一个顶尖的管理学刊物, 推动学术共同体朝向有崇高理想和社会价值观的方向发展, 迎接国内管理学知识创新时代的到来。”那么应该讲《管理学季刊》从刚开始成

① 王宇、李海洋:《管理学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及修正方法》,《管理学季刊》,2017年第3期。

② 刘东、刘军:《事件系统理论原理及其在管理科研与实践中的应用分析》,《管理学季刊》,2017年第2期。

③ 贾良定、郑雅琴、尤树洋、李珏兴:《如何在组织和管理研究中探讨调节作用? 模式和证据》,《管理学季刊》,2017年第2期。

④ 梁建、刘芳舟、樊景立:《中国管理研究中的量表使用取向(2006-2015): 关键问题与改进建议》,《管理学季刊》,2017年第2期。

立到目前来看，总体上我们的一些研究领域和办刊的定位应该是非常吻合的，因此也非常感谢四位创刊主编，他们一方面有学术的热情，在总结关键词的时候看到“学术创业”也是特别重要的关键词，他们真的是以学术创业这种精神帮助国内一些作者和一些读者搭建了一个不只是研究发表，而且是学术交流的平台。每年《管理学季刊》也会有一些会议，通过会议来交流我们怎么做更好的研究，我觉得这个确实让人深受鼓舞和感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确实四位创刊主编（都是战略学者）给《管理学季刊》的愿景、使命定位水平特别高，差不多从2016年的定位到最后实践下来，我们的目标一直非常清晰而且始终没有改变。因此，四位创刊主编，以及包括像贾良定、梁建等当年在整个期刊的创立过程中都做出了大量的贡献。

《管理学季刊》在过去四年的发展，取得了非常高的社会认可，比如，创立一年后就进入了CSCCI的期刊目录中，2020年进入了FMS高质量权威期刊的列表中，这些都是让大家感到特别兴奋的消息。当然所有这些成就都离不开《管理学季刊》的清晰定位，离不开编委会以及所有评审人无私的奉献和努力，也离不开兄弟期刊相互之间的支持以及广大的读者和作者对于《管理学季刊》的关注和厚爱。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地对《管理学季刊》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也希望把它的定位能够继续发扬光大，实现对国内学术平台发展的支持，回应中国管理实践不断发展的要求。

中文期刊主编论坛问答（Q&A）

问题1：很多年轻学者不愿意向国内期刊投稿的最大原因是国内期刊审稿太慢，很多期刊审了七八个月后直接拒稿，或者审了几个月告诉作者不刊发非教授一作的文章，如何解决这一困境？

《管理世界》李志军社长：

实事求是地说，研究中国问题、讲中国故事的文章在中国发表读者面会很广，不仅是学界的学者，还有企业高管、政府官员都会阅读，由此了解学术界的动态。文章发表在国内，影响力会更大。国内期刊确实存在审稿周期比较长，不发非教授第一作者文章的情况，但我觉得不是全部，绝大部分的期刊还是在尽心尽力地提高办刊的质量，在加快审稿速度等方面下功夫，以文章质量为第一标准，国内期刊一直都在进步、在提高。我们都希望好文章越多越好，国内学者将好文章都投到国外，使国外期刊得到发展壮大，这对国内期刊发展是不利的。

《管理学季刊》井润田教授：

《管理学季刊》的审稿周期是较快的，从投稿到发表平均为7~8个月，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快评审的进度。

问题2：请问各期刊每年的收稿量有多大？接受率是多少？

《管理世界》李志军社长：

《管理世界》的接受率在4%~5%，近几年约稿的力度加大了，包括会议上也会有一些投稿。听到一些反映说：中青年学者发稿有些难度，所以我也跟编辑部讲要重视、关注中青年学者。

《管理科学学报》张维教授：

《管理科学学报》的接受率在5%~6%，除了专论或专题有一定的约稿以外，其他均为投稿文章。初审拒稿的比率在5%左右。

《南开管理评论》白长虹教授：

《南开管理评论》一年收稿有2300~2400篇，录稿率为5%左右，每期19篇左右，一共6期。拒稿率分两轮来看，第一轮根据不同的学科与栏目大体上在50%左右，高的达到80%。第二轮是评审后拒稿。关于出版周期的问题，我们已努力做了改变，在接受上面增加了程序，正式刊发前的接收与录扩周期加快了；刊发的周期确实与收稿和刊发率有关，还不是很理想。在尊重时间原则的基础上（先接受先刊发），还需要将一些论文，包括新的思想、思路做一些组合（后接受的论文可能针对封面主题或者当下关注的热点做一些组合式的刊发）。

《管理评论》乔晗教授：

2019年我们的收稿量在4000篇以上，因为是月刊，发稿量也比较大，同时也响应作者的要求，帮助作者解决发表的问题。过去几年中，我们一直在扩版，年发表量最高为320篇，也与论文的页数有关，平均发表290~320篇。录用率在4%~5%，综述性的文章一般为主编约稿，向非常有经验的、在领域中有一定见解的学者约稿。我们特别理解作者对于论文尽快见刊的需求，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但录用与发表的总数在这里，想要继续解决发表速度的问题，只有从两个方向去努力，一方面在审稿的环节已经尽力推动，另一方面就需要进一步降低录用率，但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还是希望尽可能地支持好的文章。我们非常尊重第

三方评审专家评审的意见，严格地遵循三审三校制度，不会出现外审专家同意发表，编辑部卡掉的情况。

问题3：在中国情境下，针对中国的实践问题，作者通过哪些途径或方式可以更好地对理论层面（如理论框架、理论贡献上等）予以提升，做出比较好的、一般性的理论推进？希望各位主编给一些建议。

《管理科学学报》张维教授：

中文语境下的理论与西方理论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把所谓的理论援引到前面几位英文期刊主编语境下，存在一个所谓普适性的问题。从中国情境出发，如何得到一个相应的有一定普适性的理论，是大家都在关注的。这首先需要现有理论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包括它们之间的关系、基础假设等，然后在给定的特殊情境下，如何嵌入理论原来的假设，或者假设有哪些扩充类似这样的方法就可以考虑到一些问题。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情境，而是必须要把中国情境具体化，变成一些可以确认的假设或前提，在此基础上扩充现有的理论，这是我个人看法，不一定正确，但反映了某一种看法。

《管理学季刊》井润田教授：

总的来讲有三个层次。从中国数据中会有理论贡献，最基本的一种贡献（第一层次）就像前面几位英文期刊主编所说的，以中国数据写的论文投到国际期刊上后，往往是验证了现有的理论，最多增加一些调节变量、中介变量，总的来说文章的基本框架其实还是基于已有的西方理论，这是目前最简单、最普遍的研究。更高一点，我们需要在理论的基本假设层面上做一些研究，就像鹤丽教授举的那个例子，如

果假定中国的“关系”是弱关系的话，那么人的关系管理策略会发生怎样的影响？如果改变一个假定之后，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理论现象，可能这个解释的框架是原来的，但是假定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二种可能做出的理论贡献。第三种就是贡献了一个新的理论，在实证研究中显然很难，因此大家往往做定性研究、开发新的概念、描述概念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当然，我觉得张维教授刚刚指出这一点特别重要，中国人与西方人对理论的理解往往不一样，理论真正发展起来其实是很多个研究最后累积出来的结果，需要不断地验证、拒绝，在争辩之后形成新的理论。因此，从理论层面来看，要有好的贡献，都是一点一点积累发展的过程。

问题4：国内的期刊为什么不努力推进在线出版？这样对大家都有利，而且成本很低。

《管理科学学报》张维教授：

我们已经努力往这个方向走，但有规则的问题，可能也有运营上的习惯。我们的英文版是在线出版的，我想大家都在努力，方向应该是这样的。

《管理评论》乔晗教授：

《管理评论》是有在线出版的，我们与中国知网有优先在线的协议，所以作者着急的话，联系到编辑部会尽可能地优先在线出版，但可能在疫情期间，中国知网在线的承载率下降，所以在疫情期间在线工作有所延迟。

问题5：刚才听李社长讲强调立足中国现实问题，要纠正过度数字化、模型化倾向，是否表明《管理世界》更鼓励和偏好本土情境下的定性管理研究？

《管理世界》李志军社长：

不是的，我们倡导多种研究方法，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决定使用的方法，需要模型就做个模型，需要简单的模型就不要做成复杂的模型，不需要玩数学游戏，没有否定数学模型的意思，我们反对的是过度地使用、滥用，我们的“编者按”写得很清楚。

问题6：《管理学季刊》目前聚焦战略、创业创新和组织管理领域，随着期刊发展越来越好，请问未来可能会拓展研究领域吗？比如偏向于微观领域？

《管理学季刊》井润田教授：

目前还未考虑，像刚才几位英文期刊主编给我们的建议，好的刊物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管理学季刊》在发展过程中能获得大家的认可也是因为聚焦于专业的领域。当然，这个决定显然需要学术委员会、战略委员会、编委会的集体讨论，但目前来看，我们还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总体来讲，《管理学季刊》还是在坚守2016年成立的初衷，聚焦于战略、创业创新和组织管理领域，办成一流的中文学术期刊。

问题7：《管理学季刊》发表过一篇关于“本命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比较有中国特色，很有趣，但对管理实践似乎少了点管理意义，请问主编们如何看待这类文章？

《管理学季刊》井润田教授：

刚才很多主编都讲到，中国有很多有趣的现象，但不能被现象忽视了理论的贡献。像“本命年”，我自己猜测可能的结论无外乎就是本命年的人会更加保守一些，不愿意做太多冒险的事情，所以它背后所揭示的理论和概念是更重要的，研究结论不应该只解释“本命年”

这件事本身，更可能反映了人们的心理因素和风险倾向。因此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国内的作者都讲到理论训练问题，这样既能发现有趣的现象，同时还能得出更好的理论，包括在实践中指导的意义。

《管理科学学报》张维教授：

我觉得需要去挖掘背后的东西，只看到两件事情之间的关联是不够的，在科学研究上叫所谓的“发现一种现象”，但学者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如何去解释这种现象。我没看这篇文章，我猜测，比如从人们的风险态度角度来看，不同的风险态度决定了不同的决策结果，其实前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现在提出风险态度可能取决于本命年这样特殊的年份，那这里可能会找到一些关联，可能会找到一些新的贡献，而不是局限于现象本身的某一种观察。就又回到井教授说的，我们的理论训练够不够。

总结

《管理学季刊》李海洋教授：

非常感谢各位主编的精彩演讲和问答互动！

作为《管理学季刊》联席主编，我在审稿时也观察到了两个关于写作的共性问题，在此作下补充。第一，不少文章在讨论贡献（discussion部分）时都很简略，贡献和发现部分没有详细的讨论，没有和现有的文献进行对接。这是比较可惜的。其实很多文章是有贡献的，但在和文献脱节的情况下，文章贡献很难体现出来。第二，不少作者写中文文章很随意，错别字很多，病句很多，似是而非的句子也很多，甚至用英文的思路来写中文。我们可以更认真一些，少一些病句，把意思表达得更简洁、更清楚一些。

最后想说的是，本次主编论坛是《管理学季刊》为管理学界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的又一次新的尝试。《管理学季刊》主编论坛将作为一个品牌活动在未来持续、定期举办。中国管理研究需要更多、更好的平台，《管理学季刊》希望携手各兄弟期刊一起推动中国管理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与发展，期望创造、培养更多的热衷于管理研究的学术同路人。再次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再见！